

《朝日新闻》消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于当地时间 12 月 20 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 90 岁。

北京时间 12 月 21 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表推文称,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宣布,前主任傅高义去世,1973 年至 1995 年,傅高义教授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主任,他是我们心中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个极好的朋友,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精通中日两国事务

傅高义生于 1930 年 7 月,生前是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1950 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 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 1963—1964 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

傅高义对日本的研究几乎与中国研究同时进行。1958 年,傅高义关注到战败后的日本,对日本如何应对战后危机、重建经济繁荣和新的社会秩序产生兴趣。他去日本学了一年日语,做了一年田野调查。回美国后,出版了《日本新中产阶级》,被称为“有关现代日本最前沿美国观察家之一”。

傅高义 1961 年开始在哈佛学习中文和中古历史,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1972 年他作为费正清的继任人,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1998 年被

以研究中国为终生事业

1930 年,傅高义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一个犹太人家庭,英文全名 Ezra Feivel Vogel。决定以研究中国为终生事业后,他取了中文名“傅高义”——德语里“Vogel”发音像中文的“fugao”,加上他英文名首字母 E。E 者,义也。“义”在中文里属于很

选入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一直是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曾撰有《邓小平时代》等著作。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傅高义对中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 年)》。

1979 年,49 岁的傅高义出版了改变他人生的一本书——《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讲述了他眼中日本诸多社会模式的成功范例,对当时发展减缓的美国有借鉴意义。这本书在日本销售七十多万册。此前,他是哈佛大学一位无名学者,这部著作出版后,走在日本街头会有记者过来采访。

至此,傅高义成为当时美国为数不多同时熟谙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能从两国研究中洞察亚洲与全球局势的学者。2019 年,他推出新书《中国和日本:1500 年的交流史》,详述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彼此之间的影响。

高的道德水准,也恰恰是他心中伦理的至高境界。1973 年,他作为费正清的继任人,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

从 1958 年开始,傅高义每年去一次日本。1980 年在广州常驻,每年到一次中国。他见证了战后日本的发展与泡沫经济的破灭,

致力于帮助西方了解中国：“中国先生”傅高义

□ 张萌萌 江采欣



亲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迅猛发展。

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浸润,傅高义对迥异于西方的东亚文化有着深刻的体验。他享受到了“人情”带来的利好,广交友、善结缘是他每次访谈都会提到的。深度访谈是他最常用的社会研究方式。在中国,傅高义有很多长期交往的老朋友,他们多是身居要职的政府人员或学者,当他们因公职身份不便说话时,傅高义会以朋友聊天的方式推进他的工作,他认为,

“朋友之间谈话,彼此会更加坦诚。”哈佛大学教授与费正清研究院前院长的身份让傅高义得以接触到他希望接触的许多人,而一次次深度访谈则为他积累了足够的人脉。随着众多朋友不断成长、在各自领域担任要职,傅高义拥有了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人脉资源。

2012 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一书,证实了傅高义积累近五十年的人脉资源的分量:他的访谈对象包括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身边工作过

的高级干部和深度参与时代进程的各界人物,还有与邓小平有过接触、对邓小平有特别认知的国外政界、学界人士。这本书让傅高义在中国享有盛名。

傅高义彬彬有礼、面带笑容,这让他深陷的眼窝、突出的鼻翼、占脸长三分之一的耳朵都变得柔和。傅高义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目前的国际局势有点感叹,“现在全世界关系太复杂了,不能分开。要相互理解,相互合作,避免正面冲突。”(选载自《南方人物周刊》)

傅高义自述： 对中美关系 40 年的 观察与思考

□ 口述 傅高义

傅高义在 2018 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讲座上发表的“中美关系 40 年”谈话,曾引起了两国的广泛关注。傅高义认为自己有两个责任:一是从个人经验角度谈一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及这四十年中美关系;二是作为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学者,有责任思考为什么当下中美关系会如此紧张。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与中美关系

我从 1961 年开始研究中国,1973 年跟着自然科学代表团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1971 年尼克松总统来到中国,认为中美作为世界的两大国家、两大文化,是应该有接触的,是应该把关系搞好的。

我当时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责任是给美国人介绍东亚文化,而若要让美国人了解东亚、了解中国,就要了解改革开放、了解邓小平。于是我花了十年

工夫写了《邓小平时代》。写完时就觉得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十年后更加觉得伟大。20 世纪改变世界历史的人中谁的贡献最大?我认为是邓小平。因为自鸦片战争到 1978 年三中全会邓小平上台,中间近两百年都没有成功。而邓小平领导了中国的改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此外,我想从我个人经验的角度谈谈中美 40 年来的关系,以及我来中国的几件趣事。

我 1973 年的中国之行分别去了北京、无锡、苏州、上海。在北大时见到了周培源(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他说自己不懂,请了一个三十几岁的红卫兵来给我们讲“大跃进”。当时很多人是害怕说话的,害怕说错话。后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恢复高考后,又有一种说法说复旦、北大、清华就是留美学校,大家读完后都出国继续读书。80 年代我在广东待了一年,感觉那时全省真的很多地方非常

穷,作为一个老学者,到现在再看这些情况,感受到了非常大的改变,非常幸运。

我 1993 年到 1995 年做了两年政府工作,在约瑟夫·奈主持的国家情报理事会。后来我来到中国复旦大学,我当时写了一本书叫《Living With China》,意思是美国应该想办法与中国一起“过得去”。记得当时复旦有个年轻学者,那个小伙子说中美关系不能只考虑短期、要考虑长期的前途,讲得很好,这个小伙子就是吴

心伯。我后来见到朱镕基总理,他给我讲了个故事,说他有次来到哈佛演讲,有人问他,“你觉得中国是不是在学习日本的经济经验?”他回答“这个问题应该问傅高义”。下面的人说“问这个问题的人就是傅高义”,大家哈哈大笑。

我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美关系是非常好的,好的中美关系不仅促进了双边贸易,也使这四十年中世界各方的合作都增多了。

中美“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

美苏冷战时期,两边的贸易、合作非常少。而现在美国有 35 万的中国留学生,几百万中国人曾在美国就业,中美间的商业、社会、经济关系是分不开的。特朗普造成的麻烦是有的,但“全面脱钩”是完全不可能的。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太密切了。如何避免冲突,才是我们今天需要考虑的事情。

竞争是好事。但是回看美国的历史,最初移民来到美国,很自由,什么都能做;后来

美国发展到一定阶段,情况变复杂了,开始出现环境污染、政治正确等问题。很多美国商人对自由的想法还是因袭传统的——那种不要政府的自由。这种 19、20 世纪想做什么的自由,也反映在了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中。

美国人从小就认为自己是老大,他们不知道如果中国强大了,自己应该怎样应对。

80%的美国人是不考虑中国的事情。按照芝加哥的调查数

据,美国还是希望和中国合作,但现在华盛顿对中国的看法非常严重。

中美冲突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性,但军事冲突可能性比较低,比如两个飞机可能会碰,但双方都不会扩大事端。但就现在来看,如果北京不愿意做大的改变,而华盛顿又的确对中国持有很严峻的态度的话,中美关系后面几年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多。

(选载自《新京报》)